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 主办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LIBRARY



经管学科参考

2022 年第 4 期 总第 52 期

经管学科参考

2022 年第 4 期 · 总第 52 期

热点观察

金砖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1
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2
超七成外资企业在华增资幅度大于 5%·····	3
新加坡扩大数字经济“朋友圈”·····	4
“印太经济框架”：不见经济前景只见政治意味·····	5

学科前沿

百年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及维度·····	8
推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10
数字贸易助推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12
切实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14
应推动落实碳边境调节机制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16

经管资讯

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累计超 2 万亿元·····	18
海南探索先行先试 CPTPP 经贸规则 服务贸易扩大开放备受关注·····	20
上海公布“50 条”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	22
进出口货物总值超百亿元 上海关区 RCEP 享惠进行中·····	24
全球面临灾难性粮食危机·····	25

金砖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中国作为今年金砖国家主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等系列活动。连日来，金砖国家工业部长会议、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经贸部长会议等先后成功举办，金砖五国部长级官员围绕经贸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发布了多份成果文件。

海内外分析人士认为，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共同发展。今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意义重大，未来应该有更多国家加入金砖合作，为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正能量。

1 深化宏观政策合作

近年来，金砖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携手应对挑战、深化务实合作，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财政部副部长余蔚平介绍，中国自担任2022年金砖国家主席国以来，围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的主题，就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全球性重要经济和发展问题合作、金砖国家务实财金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经过各方共同努力，金砖国家今年在财金领域取得许多重要共识和务实成果，包括发布《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联合声明》，制定《金砖国家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技术报告》等。《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联合声明》关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风险，呼吁各方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通胀、能源和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关切的问题，敦促发达国家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把控好负面溢出效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说，金融合作是金砖国家整体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银行将与金砖各方进一步深化金砖金融合作，加强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持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高质量发展。

2 夯实工业农业基础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表示，中方将与金砖国家工业主管部门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充分利用金砖创新基地、工业能力中心等机制，搭建金砖国家工业合作网络，促进资金、货物、人员、技术、服务自由流通，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利益共同体。同时，合力加快数字化转型，加快工业互联网、5G等新兴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应用。合作推动工业领域低碳转型，扩大节能降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说，中国立足国内端牢端稳了中国人的饭碗，也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针对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唐仁健提出了三点倡议：一是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小农户发展、农村建设等方面加强知识分享、技术交流；二是坚决维护以WTO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增进农业贸易政策协同，在金砖国家内部探索构建长期稳定的供需对接机制，推进农产品、农业投入品等大宗商品顺畅流通；三是在金砖机制下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多双边农业合作，为全球粮农治理提供“金砖方案”。

在巴西伯南布哥州联邦大学国际政治教授马科斯·利马看来，金砖国家一向十分重视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是今年金砖框架下系列会议的一大重点。“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而且还在继续支持农民和农村发展项目。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分享经验。”他说。

3 携手并肩扩大开放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金砖国家第十二次经贸部长会议上，部长们一致同意加强数字经济、贸易投资与可持续发展、供应链、多边贸易体制等领域合作。同时，会议批准了《金砖国家第十二次经贸部长会议联合公报》，达成《金砖国家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和世贸组织改革声明》《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金砖国家贸易投资与可持续发展倡议》《金砖国家加强供应链合作倡议》等成果文件。其中，《金砖国家第十二次经贸部长会议联合公报》提到，金砖国家支持世贸组织所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我们将建设性参与世贸组织的必要改革，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贸易和发展，维护世贸组织在全球贸易规则制定和治理中的突出地位，支持包容性发展，维护包括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世贸组织成员的权利和利益。”该公报强调。

海关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与金砖国家双边贸易总值为 490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2%，高于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谈及 2022 年金砖国家的海关合作，海关总署副署长孙玉宁建议各方逐步提升海关基础设施、监管手段和行政管理的智能化，打造边境管理部门跨界跨境协同治理，服务构建金砖国家海关高质量伙伴关系。

“金砖合作有助于引领世界回到发展议程上来。”菲律宾金砖国家政策研究会创始人赫尔曼·劳雷尔认为，“金砖+”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和利益，有助于为全球发展提供新动能。

作者：王俊岭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 年 6 月 15 日第 003 版

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中国将不断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并与各方一道，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是 4 年多来该组织首次召开部长级会议，164 个成员的部长和代表现场参会。会议期间，众多世贸组织成员重申世贸组织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希望世贸组织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世贸组织成立以来，为推动全球贸易发展、保障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近年来，世贸组织遭遇内外压力，多边贸易体制面临诸多挑战。从内部看，多边谈判进展缓慢、上诉机构停摆等问题，让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面临严重威胁。从外部看，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个别国家甚至企图在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之外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在全球性问题交错叠加、全球贸易格局面临深刻调整的当下，如何有效发挥世贸组织作用，让多边贸易体制助力世界经济复苏，是本届

会议面临的重要课题。“现在是时候拿出急需的政治意愿，展现世贸组织能够参与解决多重全球性挑战。”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在本届会议上，有 100 多个世贸组织成员和观察员踊跃发言，发出维护多边主义的声音。“世贸组织仍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多边贸易体制将为寻找共同解决方案发挥重要作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在世贸组织中重建信任、团结与合作至关重要”……这些发言充分表明，各方希望引领世贸组织走出困难时期，推动世贸组织改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重振多边贸易体制。

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会 70 周年大会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强调，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做大合作蛋糕，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中方认为，世贸组织改革应促进经济全球化，要通过规则更新和机制保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世贸组织改革应使全体成员受益，保障发展中成员合法权益。这不仅有利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营造自由、开放、公平、非歧视、透明和可预测的贸易投资环境，也有利于遏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逆流。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最大贸易国。加入世贸组织近 21 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开放，激活了中国发展的澎湃春潮，也激活了世界经济的一池春水。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维护世贸组织规则，为多边贸易体制发展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中国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已自主将关税总水平从 2010 年的 9.8% 大幅降至 7.4%。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市场机遇、增长机遇、合作机遇。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将不断为团结应对全球发展挑战注入中国智慧和力量。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势不会改变，一个开放、公正、透明的多边贸易体制符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中国将不断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并与各方一道，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和音

来源：《人民日报》2022 年 6 月 17 日第 003 版

超七成外资企业在华增资幅度大于 5%

5 月 30 日，中国贸促会发布《2022 年第一季度中国外资营商环境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受访的外资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总体评价良好，对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报装、促进市场竞争、获取经营场所评价较高，对宏观经济和监管政策满意度总体较高。贸促会新闻发布人于毅介绍，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外资的决策部署，及时跟踪分析我国利用外资情况，助力优化外资营商环境，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贸促会通过问卷调查、企业座谈及专家访谈等方式，开展外资营商环境季度调研，完成了《报告》。

一季度，随着我国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政策效果不断显现、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外资企业普遍看好中国高质量发展新机遇，企业对未来发展的预期和信心保持稳定，吸收外资保持稳定态势。从调查情况看，与 2021 年四季度相比，71% 的受访外资企业维持了业务规模，16.4% 的企业扩大了业务规模，72.1% 的企业在华增资幅度大于 5%。外资企业持续看好在华发展前景，13.5% 的外资企业未来有在华增资打算，超半数外资企业表示市场和企业战略是

在华增资主因，42.6%的外资企业将长三角作为计划投资的主要区域。同时，受三重压力叠加疫情影响，我国“稳外资”仍面临外部环境挑战和内部条件约束“双重压力”。

调查中，受访外资企业提出五个方面主要建议：一是统筹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不断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完备性；三是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增强外企发展信心；四是精准施策，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五是持续强化外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

作者：司晋丽

来源：《人民政协报》2022年5月31日第002版

新加坡扩大数字经济“朋友圈”

6月14日，《英国—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UKSDEA，以下简称《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新加坡在积极推进数字经济，加强与合作伙伴的互联互通方面又取得新进展。

据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发布的文告，《协定》将为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设定一个全球基准，并惠及两国企业和民众，尤其有助于中小企业更好把握两国数字市场的机会。

根据《协定》，新加坡与英国为支持安全可靠的跨境电子支付发展，将促进制定透明和便利的规则，例如鼓励开放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采用国际公认的标准以及促进电子支付系统之间的互通性等。《协定》将寻求促进双边供应链的跨境数字化，重点是促进提单和发票等电子文件的互操作性，实现更快、更便捷的交易，并降低企业成本。《协定》内容还包括发展海底电缆、开放政府信息、启用无缝隙和可信赖的数字流通系统、增强数字系统的可信任度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参与度等。

近年来，新加坡十分重视推进数字经济协定的签署工作，充分抓住数字革命和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机遇。2020年6月份，新加坡与新西兰和智利签署第一份《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DEPA”），并分别于2021年1月份和11月份生效；2020年12月份，新加坡与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协定生效；中国2021年11月份申请加入DEPA；2021年12月份，新加坡与韩国完成数字关系协定谈判。另外，新加坡与欧盟、印度和加拿大等也在商讨加强数字经济合作事宜。新加坡强化数字经济地位，积极与他国构建双边或多边数字经济框架，签订数字经济协定，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政府制定了打造“数字中心”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欲成为数字经济强国。对内，致力于提升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普及和应用，加快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增强企业和社会利用数字技术的创新能力；对外，重视加强数字产品和服务在全球流动中的互联互通，为企业“走出去”搭建平台和打造合作新规则。第二，政府认识到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新动力，是促进各国和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引擎。新冠肺炎疫情使数字经济的韧性和重要性凸显。随着数字经济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数字领域规则和合作框架的制定也成为诸多双边或多边经贸谈判的重要内容，必须抓住规则制定新机遇和拥有贸易合作话语权。第三，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有利于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长期以来，新加坡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参与者、推动者和主要受益者，在当前逆全球化趋势抬头和贸易保护主义加重的背景下，必须建立广泛的自由贸易

并加强互联互通，在数字经济中创造更多发展机会。第四，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对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越来越大。微软 2020 年委托研究公司 IDC 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2021 年，新加坡约 60% 的 GDP 来自数字产品或服务。2017 年，这项占比仅为 10%。根据谷歌、淡马锡和贝恩联合发布的《2021 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预计东南亚数字经济规模将由 2021 年的 1490 亿美元增长至 2025 年的 2940 亿美元，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31%。第五，数字经济的竞争日趋激烈，积极建立数字经济双边或多边协定，有利于推动数字贸易规则协调，消除贸易障碍和壁垒，释放数字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潜能，降低贸易成本，建立争端裁决机制，实现互利共赢。第六，数字经济协定有助于鼓励伙伴国在数字身份、人工智能和数据创新等新兴领域开展合作。

今年 6 月 13 日，新加坡与中国代表在日内瓦出席世界贸易组织第 12 届部长会议期间，签署《关于加强数字经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促进绿色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在数字经济领域，两国将携手探索共同增长机会，加强投资和数字贸易方面的合作，推动数字化服务，以及建立可信安全的数字环境，为两国探索数字经济新合作领域提供新动力。

数字经济在全球快速发展，各国积极参加构建双边或多边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协定，有利于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促进建立公平、透明、开放和包容的新型经济秩序，为本国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合作注入新动力。

作者：蔡本田

来源：《经济日报》2022 年 6 月 20 日第 004 版

“印太经济框架”：不见经济前景只见 政治意味

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日本期间，5 月 23 日宣布启动所谓“印度-太平洋繁荣经济框架”（IPEF）。根据白宫网站发布的消息，“印太经济框架”首批成员包括 13 个国家：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印太地区拥有世界一半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全球的 60%。”拜登在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后发表的讲话中说，“今天在座以及今后加入的各国，要为我们所有人民打造一个自由开放、繁荣互通、安全弹性的印太地区。”从拜登的言语中就可以看出，虽然“印太经济框架”被称为拜登政府“最重要的亚太经济战略”，但人们从中看到的更多是浓厚的政治意味。

1 不谈经济谈“规则”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国选在这个时候启动所谓“印太经济框架”，是为了回应外界对其在亚洲“重安全、轻经济”战略的批评。根据白宫声明，“印太经济框架”包括四个“支

柱”领域：公平和弹性贸易，供应链弹性，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税收改革和反腐败。各国只需加入其中一个“支柱”领域并参与讨论，即可成为初始成员国。彭博社说，“印太经济框架”是2017年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来美国最重要的亚太经济战略，但白宫网站刊载的相关声明篇幅还不到两页。

《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为了吸引更多国家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美国只能尽量降低准入门槛，并根据各方意见修改条款。日本政府也希望美国采取更通融的态度，尽可能吸引更多东南亚国家。就在拜登启程访问韩日的同一天，美国官员还在起草、修改“印太经济框架”的基本内容。可以说，这份被外界评论为“空无一物”的声明，是多方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与其他传统贸易协议不同，“印太经济框架”并不是要通过降低关税、减少监管等“市场准入”机制，向其他国家开放自由市场，而是要促进“共同制定标准的伙伴关系”，因此不需要获得美国国会批准。它没有明确任何具有约束力的条款，按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萨洛尼·夏尔马的说法，“不要在意具体字眼，要关注‘印太经济框架’将产生的强烈影响”。虽然具体内容语焉不详，但“印太经济框架”建立“排华小圈子”的意图却昭然若揭。《纽约时报》报道称，一些国家“迫切希望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发挥积极作用”，否则“中国就可能主导该地区”。“印太经济框架”内容含糊不清，却提供了一个“绕开中国”的经济合作框架。与拜登同行访问韩日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对美联社表示，美国“非常非常关注与中国的竞争”，新“框架”旨在抗衡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印太经济框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美国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白宫声明中明确地说：“美国是印太地区的经济大国，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领导地位……将确保美国工人、小企业和农场主有能力参与印太地区的竞争。”

对于经济前景不明、政治意图明显的“印太经济框架”，大多数初始成员国其实也普遍持怀疑和观望态度。新西兰前外交官、资深贸易分析师斯蒂芬·雅可比指出，“印太经济框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策略，不符合新西兰向来包容开放的传统。“印太经济框架”并非自由贸易协定，也不会给新西兰外贸出口带来直接商业利益。越南总理范明政不久前在美国-东盟峰会上表示，越南愿意就“印太经济框架”与美国合作，但“需要更多时间来研究”，希望看到“更多细节”。就连“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之一的印度，也曾对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犹豫不决。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并不愿意在“印太地区”公然挑起对抗，“印太经济框架”能为印度带来多少实际利益，也要打个问号。

2 多个初始成员国加入“框架”不情不愿

前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亚洲集团合伙人唐伟康，把参与“印太经济框架”的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少数坚定的美国“盟友”，如日本和澳大利亚；另一类包括多数东盟国家在内，他们希望与中美同时保持密切关系，不愿意在二者之间选边站队。

在“印太经济框架”初始成员中，7个东盟国家只有新加坡和菲律宾一开始就表达了加入意愿。当美国强调“印太经济框架”并非反华联盟，作出“对中国同样开放”的姿态后，更多的东盟国家才愿意加入进来。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执行长李淳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把台湾纳入其中，意味着给“印太经济框架”打上了明显的反华标签，加入该框架意味着在中美冲突中站在美国一边，而东盟国家并不愿意接手这道“二选一”的难题。

“印太经济框架”首批成员名单里没有台湾，但不意味着美国在这个框架内彻底放弃了台湾这颗“棋子”。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示，华盛顿虽然把台湾排除在“印

太经济框架”之外，但仍将加强同台北的双边经贸关系，特别是“半导体和供应链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关系”。台湾也没有打消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念头。李淳表示，台湾和美国将继续“深化贸易和投资关系”，根据台美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TIFA），双方将在不久后启动双边贸易机制，台湾也可能在初始成员国落定后再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不过，这或许只是台湾方面的一厢情愿。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所说，很多国家不是美国的“盟友”，而是美国的“朋友”；即便是美国的“盟友”，很多国家也与中国保持着重要关系。他说：“你不能不跟中国做生意，因为那里有机会，那里有市场，许多国家也欢迎中国投资。”

对美国的“传统盟友”韩国而言，中国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韩贸易往来程度远超其他国家。刚上任的韩国总统尹锡悦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CNN）采访时表示：“加强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并不意味着（韩国）认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不重要。”分析人士指出，韩国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目的，是想抓住机会成为“本地区新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非“接受者”，实现韩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还有分析人士认为，尹锡悦政府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也有不让日本抢得先机、在“印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的意图。

3 “框架”前景如何很难确定

一个月后，将召开“印太经济框架”协商会议，各成员国讨论将加入哪些支柱领域的问题。《金融时报》指出，如果所有成员都只对框架内的某一两个领域感兴趣，其他领域无人问津，那么，框架前景如何将很不确定。“美国对‘印太经济框架’主要议题的描述既空洞又乏味，几乎可以预见其结果。这不是一场有趣的派对，更像一份经年累月报酬却寥寥的工作。”新加坡亚洲贸易中心执行主任德博拉·埃尔姆斯说，“任何有吸引力的派对都需要给出让人参加的明确理由，尤其是在客人们日程都很忙、类似活动众多的情况下。主人不能只考虑自己吃什么、喝什么、听什么或做什么，否则，客人们很可能不来参加聚会，或者提前离开。”对于美国政府的国际信用，一些国家心有余悸，美国也确曾有过“把客人请来后自己提前离场”的先例。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大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但特朗普上台后不久，美国政府就退出了 TPP。在“客人们”的推动下，TPP 发展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如今已有 11 个国家签署了该协定。“即便现在是拜登政府执政，我们依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可能还是像特朗普执政时那样。”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渡边博明告诉半岛电视台：“当美国对其他国家说它想干什么的时候，真的很难让人相信它的话。”

与此同时，由中国主导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日臻完善，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陆续对各签署国生效。RCEP 是当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共有 15 个成员国，包括多个东盟国家以及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内，覆盖 23 亿人口，经济总量超过全球 GDP 的 30%。除大幅降低关税之外，RCEP 还简化贸易规则，以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务实合作。《华盛顿邮报》认为，与 TPP 等美国主导的贸易协定不同的是，RCEP 对成员国并没有诸多苛刻要求，其实施意味着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正在衰退。

作者：胡文利

来源：《中国青年报》2022 年 5 月 26 日第 009 版

百年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及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研究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过程。

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历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具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化中国”，即把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在对中国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分析和理解中，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中国化”，即在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深化理性思维，并将其升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思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内涵和形式。“化中国”主要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中国化”主要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二者相辅相成、紧密结合，呈现为螺旋式上升的思想过程，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思想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分作四个阶段，展现为四次历史性变化。

第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百年历程的起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飞跃。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初步运用，是这一时期的“序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性质做出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理论，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及制度安排、经济发展及经济政策，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前途等问题进行系统论述。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运用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理论，创造性地走出了基本经济制度转型、经济体制转型和生产力持续增长同步的发展模式；接着，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经历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基础、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的阶段。

砥砺前行、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还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均取得了一系列独创性的成果。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理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理论等，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

第三，1978年至2012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重要阶段。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发展，着力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探索，在系统把握这一阶段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整体关系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制度论、经济改革论、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论和对外开放论等主导性理论

以及在主导性理论交互作用中生成的一系列衍生性理论,形成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和体系。

第四,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这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2017 年底,党的十九大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经济思想被概括为以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等七个方面“坚持”的理论要义。对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一新概括,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境界。2020 年,中国共产党在对“十四五”发展规划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长期规划制定中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的阐释,升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时代意蕴。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是五千年中华经济思想文明的结晶,是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当代世界经济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经济思想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加以考察。

第一个维度是在中华五千年经济思想文明中审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与中华文明的发展相伴随,中国经济思想文明的演进也是在曲折中谋求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正是在工业文明时代,在中华文明处于危亡之中兴起的,它改变了中华经济思想文明演进的路径。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是引领中华经济文明再次崛起的指导思想,应该把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放在中华五千年经济思想文明的演进中来审视。

第二个维度是在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历程中审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重点研究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对于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二是对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方面作出了探索,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过渡时期的经济理论;三是改革开放以来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第三个维度是在世界经济思想的发展中审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凸显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对于世界经济思想文明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如东南亚、中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高度关注,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制定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时,认真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正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刻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在全球的广泛传播值得深入研究。

作者: 顾海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邹进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 5 月 24 日第 005 版

推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趋势不断增强，许多行业企业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融合发展模式。但目前来看，产业融合发展的范围不够广、程度不够深、水平不够高，支撑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还不明显。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刻把握产业融合的规律和趋势，坚持改革创新，围绕重点行业和领域，培育多元化融合发展主体，探索特色融合发展路径，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服务业提质增效升级。

1 深刻认识产业融合内涵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扩散，一些基于工业经济时代大规模专业化分工的产业，边界逐渐模糊或消融，并在原有的产业边界融合发展出新的产业形态，成为经济增长和企业价值增长新的动力源泉。一般认为，这就是产业融合。产业融合是建立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之上的，其实质是产业间分工的内部化，即把社会化分工转化为产业内部分工。专业化分工深化细化是产业融合的基础和前提。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是相对于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而言的，是深度应用现代化技术、管理、模式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目前的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经过技术改造和管理创新后，也可能演进升级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是受技术进步、市场开放和制度创新驱动，通过技术渗透、产业联动、链条延伸、内部重组等途径，打破原有产业边界、促进产业交叉融合、育成新业态新模式，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支撑、高效协同、融合互动的动态过程，最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升级。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演进、升级，是一个主体多元、路径多样、模式各异、动态变化、快速迭代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包括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相互渗透和互动、嵌入彼此产业链价值链体系，从而形成紧密关系，也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融为一体，形成新产业新业态。从要素层面看，服务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要素的比重不断提高，服务业在整个产业链、价值链中创造的产出和价值不断提高；从技术层面看，技术创新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应用加速了产业融合进程，催生出众多融合新业态；从企业层面看，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路径增多，一些制造业企业转型为“制造+服务”或服务型企业，一些服务业企业向制造环节延伸；从产业层面看，制造业、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也会产生两者融为一体的新产业。

2 关注融合发展难点问题

近年来，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程度持续加深、趋势持续增强。但是，一些问题也值得关注。

一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影响产业融合进程。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起步较早、水平较高。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普遍存在“两个 70%”现象，即服务业占 GDP 的

70%、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 70%，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了强大支撑。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强国，制造业创新能力还不够强、质量效益还不够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尚不充分。

二是融合发展的范围不够广、程度不够深、水平不够高。从范围看，尽管我国一些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在融合发展上初见成效，但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鲜有突破，装备制造、家电等行业的融合发展起步较早，其他行业则相对滞后；从程度看，一些企业已经开展设计、采购、建造、系统集成等总承包业务，但提供优质、高效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还不强，存在核心技术缺乏、品牌影响力弱、服务增值带来的营业收入占比不高等问题；从水平看，一些领域融合发展主要是沿袭或模仿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既有模式，创新性和灵活性不够，难以适应新的客户需求和市场形势变化。

三是企业间、产业间的协同性还不强，融合发展效益没有充分释放。具体来看，许多企业缺乏外包非核心业务、专注打造核心竞争力的意识，生产经营涉及领域众多、专业化不强，难以与上下游企业形成有效的分工协作机制，导致核心竞争力弱。一方面，融合发展新业态总体规模较小，局限于领先企业的先行探索，还没有快速成长为推动发展动能转换和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行业的效益效率不高，融合发展还没有形成推动企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力量。

以上这些问题，既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和分工格局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也存在现有体制机制难以适应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进程的因素。一些行业、企业需改变“服务内置化”的封闭发展路径，积极探索新的生产经营模式。同时，也要着力解决一些行业管理方式滞后、政策不配套、标准不健全、数据不开放等难点问题，在公共数据获取、数据确权和交易、数据安全等方面加快完善制度保障，为产业融合提供良好条件。

3 瞄准融合发展重点方向

“十四五”时期，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把握产业融合发展趋势，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培育融合发展主体，探索融合发展路径，发展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创新体制机制，激发企业融合发展内生动力，实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同互促与深度融合，为制造强国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打造多元化融合发展主体。企业是融合发展主体，需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支持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对资源要素、技术研发和市场开发的有效整合，同时注重发挥平台型组织、产业集群的重要作用。既要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分工协作与联动融通，实现资源、要素、产能、市场的深度整合与共用共享，又要强化行业领军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支持融合基础条件好、技术模式领先的企业在产业融合的方向、路径、模式上先行先试，形成推广一批融合发展效果好、转型升级效应强的经验做法，还要完善平台型组织的综合服务功能，积极培育融合平台型企业，引导优势企业和上下游企业、关联企业围绕核心业务和产品共建业务信息平台、交互研发设计平台、供应链管理平台、工业云平台等，形成融合共生的产业生态圈。

二是积极探索重点行业的融合发展路径。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服务业业态众多，产业融合发展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既包括制造业向后端延伸的服务化，也包括服务业反向延伸的制造化，必须突出重点行业，根据行业特点，探索适合的融合发展路径。具体来看，可加快原材料行业和服务业融合步伐，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各个环节对接下游企业，加快原材料行业从提供原料产品向提供原料和工业服务解决方案转变；推动消费品行业和服务业深度融

合，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和居民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需求，推动创新设计、市场营销、品牌管理、售后服务等环节变革；提升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水平，发展系统集成、工程总包、远程维护等服务，拓展增长空间；推进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引导电信运营企业、互联网企业等积极转型，发展面向重点行业和区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强化研发设计服务与制造业融合发展，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新模式，通过研发设计增强制造业产品的绿色化、智能化、品牌化水平；推进物流服务与生产制造无缝对接，推动制造业借助现代供应链开展资源整合和流程优化，实现供需精准匹配，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升制造业运行效率。

三是培育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利用了现代信息技术和新型组织模式，能催生许多新业态新模式。从趋势看，共享工厂、柔性化定制、反向制造等具有很大发展前景。可依托完整工业体系和强大生产能力，面向中小企业，建立共享生产平台，推广共享工厂模式，推进厂房、设备、人才等资源整合，既能提升产能利用水平，又能节省生产投入成本；可支持企业增强柔性制造能力，将用户需求直接转化为生产订单，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个性定制与按需生产；可发展服务反向制造，鼓励服务业企业通过品牌授权、贴牌生产、连锁经营等方式嵌入制造业企业，拓展产业增长空间和增值能力；还可以推进文化旅游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支持有条件的工业企业、园区和历史遗迹通过挖掘文化底蕴、丰富品牌内涵、优化工厂设计，打造集生产、展示、观光、休闲、科普、购物等于一体的工业旅游景点景区。

作者：洪群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经济日报》2022年06月14日

数字贸易助推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让全球供应链遭遇“断链”风险，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导致全球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受阻。然而异军突起的数字技术及数字贸易，使全球得以建立起更具弹性、更趋稳定的生产系统和供应链，使各类经济体得以广泛参与到全球供应链体系之中，使供应链具有更强的抗压性和稳定性。数字贸易以其无与伦比的新发展动能，正在重塑全球供应链，助推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1 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受阻

2018年以来，美国以全球供应链安全为名，升级贸易摩擦，先后对中国中兴、华为等高新企业实施“精准打击”，全球供应链面临供应中断、技术中断、合作中断等风险。中美贸易摩擦人为增加了供应链成本，严重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的安全运行，使全球供应链出现萎缩、转移、扭曲、破坏甚至直接面临断裂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国纷纷关闭国门，封锁边境，限制人员流动。世界各国同时遭遇全球需求萎缩和全球供应中断。全球生产链、产业链及供应链等的突然断裂，引发全球流动性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困境。

2 数字贸易具有新发展动能

数字贸易是以数字平台为交易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为实体贸易货物、数字化产品及服务提供电子化信息数据交互，通过贸易合作机制，改善贸易结构和提升贸易效率，并实现智能化发展的一种新型贸易形式。数字贸易是对传统贸易形式的拓展、延伸、迭代，具有无与伦比的新发展动能。第一，生产方式的变革。数字贸易将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运用，产生高效率、低成本的复合技术，打破了资源成本的限制。伴随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发展，进行关键性生产要素的变革，新式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不断降低数据的获取、分析、存储和利用的成本，数字贸易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第二，交易方式的变革。传统的国际贸易形式采用链式交易模式，数字贸易在多重贸易主体的参与下，转向网络平台式交易模式。数字贸易交易对象，既包括货物贸易，也包含数字产品贸易，还包括数字服务。交易方式日新月异，数字贸易自由化与在线消费者保护成为数字贸易交易与谈判的争议焦点。第三，组织方式的变革。数字贸易实现了生产与消费的融合发展，依托于数据间的无限关联性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的数字化，借助竞争合作互赢理念，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数字贸易国际通行规则和贸易争端解决方案，将加快全球供应链融合发展进程。

3 数字贸易重塑全球供应链

数字贸易通过信息与网络通信技术手段，为贸易摩擦与冲突日益激烈的世界，提供了新的贸易合作方式，数字技术下的商品贸易形态为消费者提供了另一种消费体验，使全球范围内产品与服务的供需更为便捷。数字化知识与信息可成为重要交易对象，产品、服务与企业管理与信息产业的紧密结合，以保障全球跨境商品贸易流通与产业供应链的生产信息的精准对接，实现全球公共贸易信息服务共建共享、联合运营，从治理模式、运行效率等方面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缩减供应链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供应链风险。

一是数字贸易提升全球供应链运行效率。在现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制造商、中间商及销售终端随着链条层级的增加，供应链运行效率下降。然而，数字贸易通过全球范围内共享贸易信息，对供需匹配关系进行重构，打通了供应链的供需与信息交互。制造端，通过提高产品信息监测与应用能力，促进制造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销售端，通过对交易的信息化、数据化和智能化建设，解决了销售过程中的信任、质量控制及价格评估等关键问题；在供应方面，加快了仓储、物流和金融的数字化升级，以实现需求和供给精准匹配和对接。数字贸易通过数字技术与贸易开展过程的深度融合，构建新型供需关系、协作关系和合作共赢关系，提升了全球供应链的运行效率。

二是数字贸易缩减全球供应链成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数字贸易平台能对全球采购、生产体系、支付体系、跨境物流体系、信息管理体系、全球运营服务等进行有效渗透和生态化整合，使全球供应链参与者的搜集成本和获取信息成本大幅降低。交易过程的全程跟踪、监督、顾客评价及售后服务也变得更加高效、快捷和透明，供应链的运行、组织和协调成本显著降低。在数字贸易框架下，供应链结构更趋扁平化，供需双方的贸易距离、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大大缩短。数字贸易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企业，带来了更多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稳定的多源开源供给有助于进一步缩减全球供应链的其他成本。

三是数字贸易缓解全球供应链风险。数字技术使全球得以建立更具弹性、更趋稳定的生产系统和供应链体系，使得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具有更强的抗压性和稳定性。在全

球供应链运营过程中，电子数据交换及数字化信息与产品的传输和跨境流动，为合作缓解全球供应链风险提供了可能，如通过平台构建风险预警机制和风险应对机制，共同管控中断风险。数字贸易下，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效率得到提高，高效交换的离散数据以及高速信息处理能力，可整合企业贸易信息数据库，为全球供应链风险提供了缓释传导路径。在区域供应不确定情况下，企业之间各类交易可实现高效配对，降低供应中断风险。数字贸易平台促进多流合一的全球供应链生态协同，实现全球供应体系的强稳定性，提供创新化生态的风险缓释路径。数字贸易下，供应链体系的风险应对能力得到提升。

四是数字贸易重构全球供应链治理模式。数字贸易重构新型全球供应链体系。数字贸易下，新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不断涌现，并从其产生开始就具备全球生产和消费属性，将推动数字产品全球供应链分工模式诞生。更多的产品种类、更大的服务范围、更便捷的供给方式将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到国际生产分工中来，为全球供应链体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不断扩张贸易边界，拓宽新兴贸易领域，并推动全球供应链体系重构，倒逼全球供应链转型升级。

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为全球供应链转型发展提供保障。世界范围内尽管还没有出台一套专门服务于数字贸易的法律规则体系，但在国家共识基础上组建标准化机构，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共同制定全球数字贸易国际通行规则和贸易争端解决方案，通过程序保障合理避免单边规制措施，发挥非国家力量协调作用，淡化国别政策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高新企业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管控研究”（20BJY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友 余袁涛（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5月25日第011版

切实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并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近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同样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出要求、作出部署。市场主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活跃力量和核心载体。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增加有效供给、引领消费升级的关键一招，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而我国经济保持稳定恢复态势，显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这离不开宏观政策的支持和上亿市场主体的努力。近两年，我国各类市场主体发展迅猛，总规模已超过1.5亿户，仅个体工商户就带动了近3亿城乡人员就业。但受新冠肺炎疫情不确定性、成本压力、融资难、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我国市场主体发展还面临着市场需求不足、市场空间拓展有限、创新能力不强等一系列困难，抑制了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和创造力。为此，必须突出问题导向，破瓶颈、补短板，有针对性地从事外部环境到内在动力系统进行施策，全面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一是着力开拓外部市场，提升我国市场主体面向全球的资源配置能力。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也需要更有实力的市场主体参与。这就要求充分利用“一带一路”

以及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建设带来的战略机遇，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便捷流通，帮助企业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优化企业“走出去”“引进来”政策体系，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发展成为我国进出口主体、对外投资主体。加速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合作，加快形成一批特色突出、规模较大、外向度较高的市场主体。发挥双边及多边合作机制对中小企业“走出去”的引领作用，持续推动中国—东盟、中国—中东欧国家以及中欧、中德、金砖国家等合作，鼓励中小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加快推动服务业高水平开放，抢抓 RCEP 机遇，积极开拓服务贸易市场空间，发挥好我国已有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及服务业扩大开放示范试点地区的招商引资作用，推动市场主体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不断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充分发挥跨境电商作用，加快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积极拓展新兴市场。

二是注重优化制度环境，提升市场主体主动求变的创造能力。注重优化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等职能，提供规范高效优质的政府服务，有助于企业专注发展、求新求变。这就要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继续削减行政审批和许可事项，借鉴沿海地区经验制定出台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统一目录，建立健全行政审批“中介超市”，以最优的服务和政策，加快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把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深入落实公平竞争审查等制度，积极清理妨碍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歧视性政策，有效破除限制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参与市场公平竞争的不合理壁垒和垄断行为，构建大中小企业有序竞争、协同共生的生态群落式发展格局。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企业改革创新，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合规经营，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充分调动和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三是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提升市场主体顺应产业变革的技术创新能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出特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持续以新科技应用为突破口，让数字经济赋能市场主体，打破产业主体内外信息连接壁垒，持续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当前，我国仅有 25% 的企业实施了数字化转型，中小企业则占比更小。据测算，通过数字化转型可有效降低各类企业的经营成本、提升企业收入。其中，数字化转型可使制造业企业成本降低 17.6%，营收增加 22.6%；使物流服务业企业成本降低 34.2%，营收增加 33.6%；使零售业企业成本降低 7.8%，营收增加 33.3%。大力推动企业“上云”，以制造业企业升级为重点，加快推进智能化改造，加速工业互联网平台在传统制造业的渗透应用，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支持企业“用数”，充分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依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大数据资源中心，加快政务数据有序开放、授权运营，推动政务数据与行业数据、社会数据、企业数据融合创新，助力企业开发更多有益于经济社会的创新应用。大力服务企业“赋智”，充分挖掘“城市大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应用潜力，强化核心共性技术能力支撑，助力人工智能应用快速开发和集成创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赋能。

四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市场主体适应需求变化的调整能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企业提供资源要素配置高效、市场运行有序的发展环境。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机制，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等制约，切实增强企业应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和调整能力，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竞争力。以“互联网+政务服务”为突破口，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倒逼政务服务流程优化精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夯实服务型政府建设，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对标国际一流建设高水平营商环境，依托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深入推进市场主体准入准营退出制度

改革，建立健全企业开办的各项便利化举措，通过释放改革红利更好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五是持续抓好降本增效，提升市场主体化解成本压力的能力。企业经营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自身创新活力和市场竞争能力。降低成本，既要注重降低要素价格成本，更要注重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强化政策落实，进一步增强已有政策效能，围绕国家已出台的系列减税降费措施，开展政策措施宣传下基层、入企业、进园区等活动，切实把各项惠企政策宣传到位、解释到位、落实到位。强化要素保障，创新要素配置方式，全面优化资金、土地、科技、能源、人才等保障体系，助力企业提高经营效益。强化针对不同类型的融资服务，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扩大直接融资，加快发展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等融资方式，完善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降费奖补政策，强化对优质民营企业、高成长性科技企业的金融供给，多措并举帮助企业化解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难题。探索科技创新领域 PPP 模式应用，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协同创新平台，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联合研发攻关，助力企业有效降低产品和技术研发成本。

作者：杨果（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 6 月 1 日

应推动落实碳边境调节机制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

碳边境调节机制是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关键补充措施，同时也是《欧洲绿色新政》中最具争议的政策，吸引了多方关注。2021 年中国生态环境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单边措施，可能把气候问题扩大到贸易领域。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涉及气候变化应对、政治外交、国际贸易等多个领域，具有较大影响。欧盟作为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在贸易、科技、气候等多个领域都有合作，欧盟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必将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第一，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推行可能会提高中国对欧盟出口高碳产品的成本，从而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碳边境调节机制一旦实施，对于可能覆盖的高碳行业具有重要影响，将给中国对欧出口商品（不仅仅是高耗能产品）带来额外成本，同时会降低中国相关产业的竞争力。目前已有研究机构估算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推行，将会给中国带来 6.8%至 11.6%的出口价值损失。其中，钢铁行业受到影响的贸易额最大，其次为铝行业出口，两个行业每年或将为支付的碳关税在 20 亿-28 亿元人民币左右。第二，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推行可能会引起绿色贸易壁垒。未来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可能进一步尝试出台类似的绿色贸易壁垒政策，以此来增强自身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综合竞争优势，掌握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第三，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推行不仅会给中国碳密集型产业带来消极影响，也可能对中国的产业转型和出口产业调整带来影响。碳边境调节机制将通过进口关税价格即碳价格，冲击高碳产业出口。

虽然欧盟对于推行碳边境调节机制具有较强动力，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其推行可能仍将面临诸多阻碍。决策者主要面临以下三个原则性问题，即能否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能否实现低成本减排，以及能否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因为如果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负担，可能也不利于减排。第一，由于覆盖行业有限等问题的存在，碳边境调节机制能否真正促进碳减排还有待商榷。第二，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实施相当于给出口到欧盟的贸易国施加了相同水平碳价格，在各国碳减排力度不一的情况下低成本减排的切实可行性仍有待考量。第三，碳边境调节机制因将减排负担转移给出口排放量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饱受批评，该项机制显然不满足上述第三个原则性问题。因此，在设计碳边境调节机制及类似的气候贸易政策时，很难保证这三个目标同时实现。

在实际操作中，碳边境调节机制在排放核算、贸易原则、利益协调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对碳排放的核算较为困难。许多国家既没有能力，也缺乏资金和技术以建立与欧盟碳市场水平相当的核算体系。二是碳边境调节机制与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歧视”原则相违背。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实质是强迫其他贸易国与欧盟一同进行对等程度的碳减排，这不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三是各经济体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利益分歧。欧盟各成员国内的气候变化应对力度不一，美国与欧盟之间也有立场差异。美国气候特使特里曾警告欧盟，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应是欧盟应对全球碳泄漏问题的最后手段。此外，以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于碳边境调节机制普遍持反对态度。

碳边境调节机制将对中国出口产生重大影响，政府应该主动研究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潜在影响并制定应对策略。针对目前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有关内容应未雨绸缪加以应对，相对应的政策建议有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数据监测评估，摸清碳边境调节机制覆盖行业的碳排放情况。对各行业的碳排放量开展长期、持续、全面的监测评估，做到碳排放数据“可测量、可追溯、可核查”。

第二，努力推行市场手段，利用显性碳价引导高碳行业发展。为了兼顾他国出口商品的现有碳成本，碳边境调节机制考虑到了认可进口产品所在国家显性碳价的情况。因此，将全国碳市场的覆盖范围扩大至碳边境调节机制所覆盖的部门，用显性碳价来引导行业发展，可能是中国应对该机制的有效政策工具。

第三，加强谈判沟通，循序渐进推动碳边境调节机制透明化。目前，有关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具体落地措施仍然处于讨论修改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应该与欧盟、美国、英国等加强谈判沟通，强调发展中国家定位，呼吁碳边境调节机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落实。

第四，谨慎应对，中国应主动作为，重视利用外交手段解决气候问题，强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意识，联合应对发达国家施加的压力。一方面，在国际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合作、共同应对，强调发展中国家人均碳排放水平低、贡献量少等历史事实，重申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减排义务。另一方面，中国应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依托“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等合作机制推动建设气候准则与治理机制。

作者：林伯强（嘉庚创新实验室研究员、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2022 年 5 月 28 日

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累计超2万亿元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9日，我国已累计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超2万亿元；累计有15483亿元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户，超过去年全年办理退税规模的两倍，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了强力支撑。

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等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因时应势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作出的重大决策。政策主要惠及哪些市场主体？如何精准落实到位？又将发挥哪些效应？

1 退税减税释放红利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坚持‘快退税款、狠打骗退、严查内错、欢迎外督、持续宣传’五措并举，进一步落准落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特别是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让‘真金白银’以最快速度直达企业，更好助力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荣海楼表示。

截至6月9日，已累计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超2万亿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4月1日至6月9日，已有14250亿元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户上，再加上一季度继续实施此前出台的留抵退税老政策1233亿元，已累计有15483亿元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户，超过去年全年办理退税规模的两倍；二是1月至4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2440亿元，包括小规模纳税人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新增减税335亿元，“六税两费”减半征收政策新增减税降费476亿元，将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100万元至300万元部分再减半征收政策新增减税164亿元；三是继续实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政策累计缓缴税费4289亿元。

作为今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重头戏”，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施情况备受关注。具体来看，4月1日至6月9日，微型、小型、中型企业存量留抵税额集中退还基本完成，小微企业依然是受益主体。已获得退税的纳税人中，小微企业数量占94.9%，共计退税7039亿元，占49.4%；中型企业数量占4.4%，共计退税3412亿元，占23.9%。从行业看，享受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的制造业等六个行业受益明显，纳税人获得退税7736亿元，户均退税115.2万元。从区域看，退税金额与地区经济体量相对应，东部地区留抵退税总量较大，共获得退税7391亿元。

“一系列税费支持政策红利逐步释放、成效日渐显现，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提振信心发挥了积极作用。”荣海楼介绍，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开展了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落实情况专项评估，98.05%的税人对税务部门落实税费支持政策工作表示满意。

2 助企纾困成效显著

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在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税务部门组织开展的企业抽样调查显示，退税资金主要用于扩大生产、技术研发、支付薪酬等方面，改善了企业现金流。5月份，全国享受退税企业采购支出同比增长10.9%，较留抵退税前的一季度加快3个百分点，增幅比无退税企业高7.5个百分点。同时，退税企业经营投入稳中有升，5月份退税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6%，较一季度加快5.2个百分点，增幅比无退税企业高9.6个百分点。

“从采购及销售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享受退税的企业比没有退税的企业有更高增幅，反映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改善和市场活力增强，这对于当前拉动需求及增长非常重要，留抵退税为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表示。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留抵退税政策的主要受益群体。数据显示，5月份，小微企业中的退税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7%，较一季度增加16个百分点，增幅比无退税企业高17.8个百分点。

疫情期间，留抵退税“真金白银”为困难企业送上“及时雨”。批发零售、民航、旅游、文化艺术等服务业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其中，有81.4万户困难行业企业享受退税2593亿元，5月份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较一季度增加6.9个百分点，增幅比无退税企业高14.3个百分点。

此外，留抵退税还助力重点行业高质量发展。5月份，制造业等六大行业退税企业采购支出同比增长14.7%，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增幅比无退税企业分别高6.3个、8.3个百分点。“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留抵退税增强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将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持续正向的拉动效应。”李旭红说。

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国务院决定在更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新增的1400多亿元退税款要在7月份基本退到位。

“预计今年退税达到1.64万亿元，将直接为市场主体提供现金流，有效缓解困难企业资金压力。”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司长谢文表示，税务机关将严格落实依申请受理留抵退税的工作程序，进一步加快办理进度，尽早让市场主体享受红利，及时帮扶企业渡难关、复元气。

3 内外并重严防风险

为确保留抵退税政策落准落好，税务部门坚持内外并重防风险，对外坚持“狠打”，充分发挥六部门联合打击机制作用，严打骗取留抵退税行为，坚决不让退税红包落进不法分子腰包。

2021年10月，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建立常态化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工作机制，致力于打击“假企业”“假出口”“假申报”等涉税违法犯罪行为，取得阶段性战果。近期，广西、深圳、安徽等19个省份陆续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抓捕一批虚开骗税人员，战果持续显现；截至6月9日，全国已公开曝光314起骗取留抵退税案件。

“自 6 月起，大型企业存量留抵退税开始集中退还，更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也将适时启动，打击骗取留抵退税形势更加严峻复杂，任务更为艰巨。”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副局长江武峰表示，税务部门将进一步深化部门协同共治，加强数据共享，加大力度查办团伙式、跨区域、虚开发票虚增进项等恶意骗取留抵退税案件，持续加大典型案件曝光力度，确保不发生区域性、行业性、系统性骗税风险，为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落实落地保驾护航。

同时，税务部门对内坚持严查，严肃查处税务人员在落实留抵退税等政策中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失职失责行为。截至 6 月 9 日，各级税务部门主动自觉查处了一批税务人员该审核不审核、该把关不把关等失职失责的案件，目前已经公布 35 起。

作者：李华林

来源：《经济日报》2022 年 6 月 18 日

海南探索先行先试 CPTPP 经贸规则

服务贸易扩大开放备受关注

作为全国唯一的自由贸易港，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探索制度集成创新的同时，也承担着为更高水平开放做压力测试的重任。在近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海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已成为海南省今后五年的重点任务之一。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在谈及今后五年的工作时表示，海南正在探索先行先试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作为改革开放高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自由贸易港，其任务就是不断为国家试制度，对比国际经贸新规则和我们现有发展水平之间的不同，先行先试，寻求突破点。”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1 对标更高标准

“申请加入 CPTPP 意味着中国对自身的管理水平、法律制度等提出了更高要求。”相较于全国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制度集成创新优势更适合进行压力测试。海南省常务副省长沈丹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上表示，开放不仅是要素开放，更强调制度开放，在要素开放的基础上，推动更高层次的制度型开放。

“CPTPP 就属于这样一种高水平的开放，海南也在研究对标 CPTPP 中的一些规则，如何做才能既有利于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发展，又有利于推进区域的合作，这是我们现阶段要去考虑的重点。”沈丹阳说。

中国于 2021 年 9 月提出申请加入 CPTPP。CPTPP 是当今世界最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主要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与自由化有关，包括关税、市场准入、贸易便利化等方面；二是更高标准的制度型开放，覆盖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边境后规

则”。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彭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申请加入 CPTPP 意味着中国对自身的管理水平、法律制度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加入 CPTPP 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是以开放促进改革，实现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

“加入 CPTPP 和加入 WTO 的时候是一样的，原则上我们的政策、法律制度等在加入前要与 CPTPP 的现有规则保持一致，但也可以有一定的过渡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告诉记者。

多位熟悉国际经贸规则的专家表示，加入 CPTPP 遵循协商一致的原则，具体的承诺要与其他成员达成一致，都是有谈判空间的。“有一个成员不同意，就无法加入。”彭俊说。

对于海南是否可以作为单独关税区的观点，多位受访对象表示“不可行”。沈丹阳也明确表示，CPTPP 是个以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加入的多边贸易体系，所以海南不可能加入 CPTPP。海南可以对标 CPTPP 中的高标准规则，既有利于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发展，又有利于推进区域合作。

2 探索服务业扩大开放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是当前国际高标准自贸协定在做出相关领域开放安排方面采取的一种主要模式。

如何打造与 CPTPP 兼容的监管规则，为全国制度型开放做压力测试，海南一直在探索。

“我们积极对标国际经贸新规则，但也要结合实际，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张威认为，目前看来，海南对于中国开放的意义在于探索服务业的扩大开放，尤其是在旅游、医疗、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海南具有一定的区位和政策优势。

相较于全国其他自贸试验区，海南可以在全岛范围内进行试验。“有些服务业的服务半径很长，需要一定的辐射范围，如果限制服务半径，对它的开放可能就没有太大意义。海南更具有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有利条件。”张威说。

2021 年 7 月，《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 年版）》发布，这是我国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该负面清单共 11 个门类 70 项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外的领域在海南自贸港内按照境内外服务及服务提供者待遇一致原则实施管理。

“这算是向 CPTPP 靠拢的一个方面。”屠新泉说。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是当前国际高标准自贸协定在做出相关领域开放安排方面采取的一种主要模式。目前，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相关的减让表，以及我们国家签署的自贸协定，在跨境服务贸易领域都是采取正面清单方式作出承诺。比起货物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开放，我国在跨境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安排相对有限。

沈丹阳表示，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开放有诸多诉求，但有关服务业的开放，海南相对比较慎重。“去年中央给海南出台了国内第一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这是否可以对照 CPTPP 的标准，参照 CPTPP 成员国服务贸易的限制，把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进一步压缩，再把它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进行合并或兼并，海南一直在研究。”

负面清单规则是目前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大方向，但只有清单并不代表更高水平的开放。张威告诉本报记者，以中国的实践来看，真正重要的是负面清单背后的管理，服务贸易涉及的领域和行业众多，存在准入不准营的情况，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在开放发展和保

障安全之间寻求平衡，是海南现阶段要探索实践的。”她说。

3 打造制度高地

无论是在自由化上，还是在高标准对接上，海南都具有先行先试的优势。CPTPP 核心内容里涉及的国企规则、劳工保护、跨境数据传输等，我国还存在一些差异，但都在积极探索中。CPTPP 中涉及国有企业的章节主要在第十七章，包括商业考虑、非歧视、透明度和非商业援助几个方面。彭俊告诉记者，前三个方面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已经承诺过了，目前有难度的主要是非商业援助。

“这些条款所追求的竞争中立与我们国企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我们担心的是 CPTPP 通过条款留下了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歧视性待遇的空间。”彭俊解释道。无论是在自由化上，还是在高标准对接上，海南都具有先行先试的优势。

自由贸易港往往具有“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的特点，这是海南 2025 年封关前后要逐步实现的目标之一。“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是国家在划定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时候就赋予的目标。”彭俊说。

屠新泉则认为，试验的意思就是政策可能存在风险，海南作为一个岛屿，与国内其他陆地有着物理隔离，万一有风险，影响比较小。另外，海南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基础相对落后，赋予海南更多优惠政策，也能推动海南自身的发展。

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跨境数据流动问题，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观点截然不同。“如何在数据自由流动和数据监管之间形成平衡，是包括海南在内的一些试验区要去探索的。”彭俊说。

记者了解的情况表明，海南计划到 2025 年完成三条直连境外的国际海缆，初步建成国际信息通信开放试验区，全面支撑海南自贸港建设和封关运作。

“单点突破不容易，如何把一手好牌打赢，充分发挥制度集成优势，是当前海南要重点探索的。”张威说。

作者：裴昱

来源：《中国经营报》2022 年 5 月 23 日第 A03 版

上海公布“50 条”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

《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5 月 29 日公布。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更加有力、更加高效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经济恢复和重振攻坚战，围绕落实国家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在充分听取各类市场主体诉求和建议的基础上，本市制定了上述《行动方案》。

经初步测算，本轮《行动方案》提出的政策措施叠加 3 月底市政府出台的“21 条”政策，预计全年将为市场主体减负各类资金规模达 3000 亿元。《行动方案》共包括八个方面、50 条政策措施，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四大板块”：

第一板块主要是全力助企纾困。针对企业实际困难，从阶段性缓缴“五险一金”和税款、扩大房屋租金减免范围、多渠道为企业减费让利、加大退税减税力度、发放援企稳岗补贴等方面，综合实施“缓免减退补”政策，多管齐下为企业减负。在缓缴方面，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 5 个特困行业以及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缓缴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可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纳税人可延期纳税申报或申请延期缴纳税款。在减免方面，除减免房租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减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非居民用户给予 3 个月应缴水费、电费、天然气费 10% 的财政补贴，免收 3 个月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等。在退税和补贴方面，进一步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力度，在更多行业实施增值税增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对餐饮、零售、旅游、交通运输、文体娱乐、住宿、会展等困难行业企业给予一次性稳岗补贴，对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第二板块主要是复工复产复市。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是当前各类企业非常关注的问题。针对复工复产卡点堵点，提出了分类指导、动态修订复工复产复市疫情防控指引、取消企业复工复产复市不合理限制（6 月 1 日起取消企业复工复产审批制度）、扩大企业防疫和消杀补贴范围、建立长三角产业链供应链互保机制、畅通国内国际物流运输通道等政策措施，支持各行业领域复工复产复市，稳步提高企业达产率。

第三板块主要是稳外资外贸、促消费投资。围绕稳外资稳外贸、促进消费加快恢复、发挥投资关键性作用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力度的政策举措，全面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在稳外资方面，建立重点外资企业复工复产专员服务机制，启用重大外资项目线上服务系统，提前启动 2022 年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工作，进一步支持跨国公司在沪设立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着力稳定外资企业预期和信心。在稳外贸方面，加大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等支持力度，鼓励港航企业减免货物堆存费和滞箱费，助力外贸企业履约订单。在促消费方面，以大宗消费为抓手，年内新增非营业性客车牌照额度 4 万个，按照国家政策要求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对置换纯电动汽车的个人消费者给予一次性 1 万元补贴，支持大型商贸企业和电商平台发放消费优惠券，支持文创、旅游、体育产业发展，大力促进消费加快恢复。在扩投资方面，加强城市更新规划编制、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年内完成中心城区成片旧区改造，全面提速零星旧区改造，年内新启动 8 个以上城中村改造项目。全力推动在建项目复工复产和新项目开工建设，支持扩大企业债券申报和发行规模，将新型基础设施等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进一步发挥基础设施 REITs 作用，充分引导和激发社会投资。

第四板块主要是强化支撑保障。围绕资金、土地、人才、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一批支撑保障性的政策措施，同时进一步研究储备一批新的政策措施。在要素保障方面，加快涉企专项财政资金拨付和执行进度，完善专项资金使用和评价方式，统筹用于对经营困难的企业给予房租、贷款利息、担保费、稳岗就业等补贴。支持中小微企业无缝续贷，深入实施“浦江之光”行动、支持企业上市融资；按照国家政策要求，将商业汇票承兑期限由 1 年缩短至 6 个月，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交易费用能免尽免；降低市、区两级政策性融资担保费率，实行贴息贴费政策。保障土地要素供给，尽快启动土地市场交易，增加年度建设用地计划。在民生保障方面，多渠道稳定和扩大就业，加大培训补贴力度，落实高校毕业生见习补贴、求职创业补贴等各项支持政策。优化人才直接落户、居转户、购房等条件，吸引和留住各类人才。通过发放一次性补贴、爱心礼包等形式，保障困难群众生活。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持

续开展各层各级领导干部“防疫情、稳经济、保安全”大走访、大排查，建立企业诉求快速回应和解决问题的服务机制，实施市场主体纾困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计划，提高“一网通办”全程网办率，完善信用修复机制，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稳定平台企业及其共生中小微企业的发展预期。

下一步，全市各部门、各区将抓紧出台实施细则，明确申报流程和办事指南，实行免申即享、一键即享、线上办理、精准推送等措施，确保各项政策以最快速度落实落地，高效直达市场主体。

同时，本市还将根据国家新出台的政策、企业反映的问题和诉求，及时补充和刷新政策，加强督促检查和政策评估，全力以赴抗疫情、稳经济、促发展。

作者：宰飞 俱鹤飞

来源：《解放日报》2022年5月30日第001版

进出口货物总值超百亿元

上海关区 RCEP 享惠进行中

截至5月23日，上海海关今年共受理 RCEP 享惠进口报关单及签发出口原产地证涉及的总货值超过100亿元。其中，累计实现 RCEP 进口关税减让破7000万元，出口货物预计在对方国家享受关税减让超5000万元。

5月16日，上海精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单证业务员陆喜燕顺利领到了上海海关签发的新一批 RCEP 原产地证书。她欣慰地表示：“公司复工复产后，37批次货物的原产地证书都及时拿到了，预计出口享惠可达25万元，公司的订单能顺利交付了。”

4月，精发实业被纳入上海第一批重点复工企业保运转“白名单”。复工复产在即，出口至日本和东南亚的货物也将开始出运，但企业的担忧也随之而来：出口至越南和日本的货物航程特别短，货物到港后如不能及时出具原产地证书，会滞留港口无法清关。特别是输往日本的货物自 RCEP 生效后享受关税优惠幅度很大，原产地证书需求更加强烈。但企业工作人员处于封控状态，怎样才能取得原产地证书呢？

没想到，金山海关通过对辖区内复工复产企业开展调研排摸，“跨前一步、提前介入”主动找到了该企业。在获悉企业困难后，金山海关通过提供政策咨询和实际操作指导，落实了对企业的证书申请、自助打印、证书流转等多个环节的帮扶，灵活采取自助打印、无接触签发等多种形式办理相关原产地证书。

无独有偶，奉贤辖区内泰鼎屹（上海）塑料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忠前不久接到了奉贤海关宣传 RCEP 政策的电话，“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项政策很适合贵公司进出口需要……”听到这些，周忠十分欣喜。“我们是一家生产塑料包装袋的小微企业。感谢海关帮助我们，

尤其是现阶段外贸企业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让我们这样的小企业也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据悉，泰鼎屹公司生产的产品主要出口至日本，完全符合 RCEP 原产地规则。该商品原来按照 3.9% 的最惠国税率征税，使用 RCEP 产地证后即可享受 3.5% 的优惠税率，让企业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红利。3 月底以来，该公司已申领签发 RCEP 原产地证 29 份，出口货值逾 1000 万元，为企业节约成本超过 4 万元。

上海海关积极做好 RCEP 实施推进各项工作，今年以来，上海海关联合市、区商务等相关部门共同开展线上线下政策宣贯 7 场，涉及企业 800 余家；结合上海疫情管控实际情况，搭建 RCEP 原产地应急保障机制，成立业务专家组远程指导；加快审核企业 RCEP 原产地签证申请，做到日清日结；通过 12360 海关咨询热线对企业的政策咨询和业务操作进行答疑解惑，保障 RCEP 进出口业务开展。

下一步，上海海关将继续加大 RCEP 政策宣贯和培育力度，面向企业开展规则解读和辅导，积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帮扶企业享受政策红利，通过现有工作机制在进出口两端协调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促进外贸保稳提质。

作者：顾春娟

来源：《国际商报》2022 年 6 月 1 日第 003 版

全球面临灾难性粮食危机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比斯利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俄乌冲突加重了全球粮食危机。受气候变化以及疫情造成的供应瓶颈，去年全球约有 38 个国家的约 4400 万人口处于饥饿的边缘，到今年年底受饥饿威胁的人数可能要再增加 4000 万。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解决方案。乌克兰正在游说获得更多支持，而俄罗斯指责西方通过制裁造成了粮食危机。乌克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小麦出口国之一，在大麦、玉米和葵花籽油的世界市场上也占有很大份额。据比斯利称，仅乌克兰生产的粮食就可以供应 4 亿人。根据另一项研究，乌克兰和俄罗斯占世界粮食贸易的 12%。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2022 年 6 月 1 日